



夏丏尊



丰子恺



朱自清



冯三昧



刘薰宇

悦读 白马湖派 散文家

朱惠民 编著



经亨颐

夏丏尊

郭振铎 俞平伯

徐慰南 王世颖

丰子恺 邯三昧

叶圣陶 刘大白

劉延陵 劉薰宇 劉叔琴

朱自清 朱光潛

李叔同 陳望道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悦读
白马湖派
散文家

朱惠民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悦读白马湖派散文家 / 朱惠民编著. — 宁波 : 宁波出版社 ,
2015.11

ISBN 978-7-5526-2283-6

I . ①悦 … II . ①朱 … III .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 ①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3389 号

悦读白马湖派散文家

编 著 朱惠民

封面设计 张科敏

责任编辑 苗梁婕 沈建国

责任校对 叶呈圆

责任审读 谢阳阳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邮编：315040)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3.75 插页 6

字 数 350 千

版次印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2283-6

定 价 38.80 元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揭载于1924年1月25日的《东方杂志》第21卷上。图为《东方杂志》封面



俞平伯初泛秦淮时，题诗赠给朱自清的一张明信片，俞平伯后将诗修改为：来往灯船影似梭，与君良夜爱闻歌。柔波犹作胭脂晕，六代繁华逝水过。并题《癸亥年偕佩弦兄秦淮泛舟》



《银红的衫儿》丰子恺作(1925年)，俞平伯诗集《忆》插图

朱自清长女朱采芷四岁时，丰子恺作画，夏丏尊题字贺禧。此画后作为散文《儿女》的插图发表



《春晖》半月刊，图为朱自清《刹那》刊于第30期



《我们的七月》《我们的六月》里的丰子恺漫画



《我们》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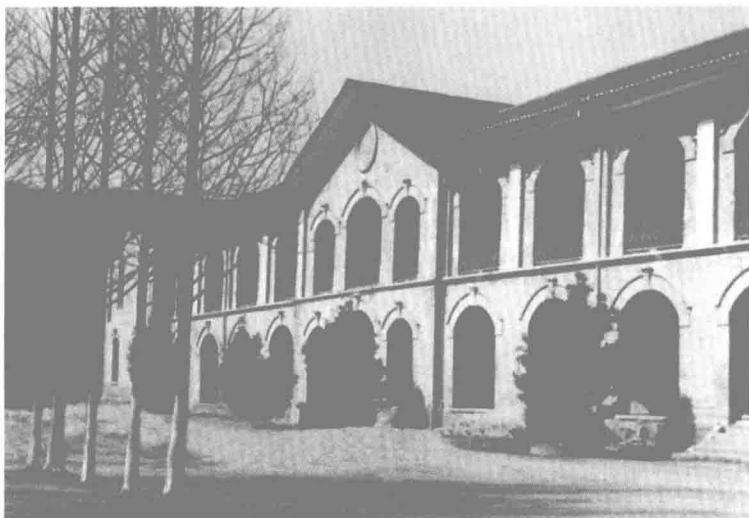
《剑鞘》叶圣陶、俞平伯著，
朴社 1924年11月初版



夏丏尊翻译的日本田山花袋的《棉被》
书衣，为丰子恺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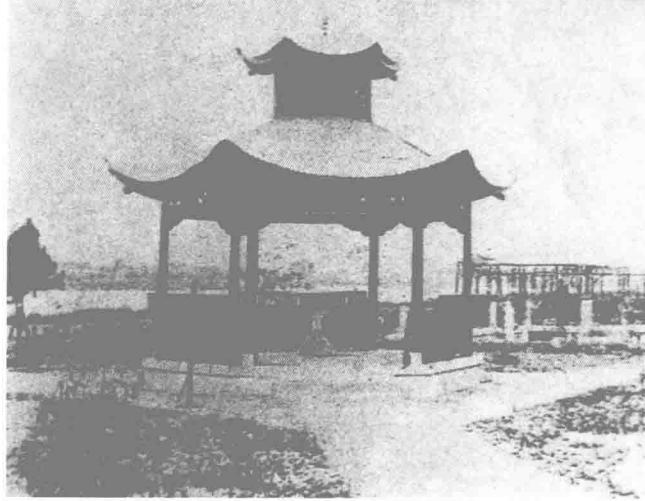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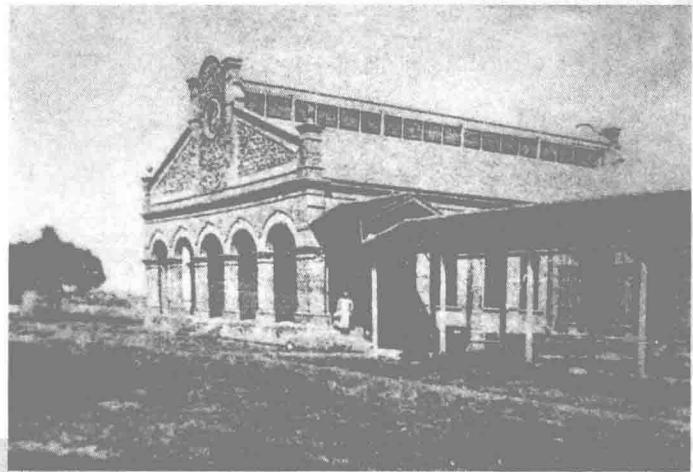


夏丏尊为弘一法师（李叔同）篆刻的印章及其边款



春晖中学教学楼，夏丏尊、
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
等曾在此作过演讲

宁波市立四中讲堂，朱自清曾在此作
过演讲《我们对于文学的态度》



宁波四中校园里的乐群亭，朱
自清等曾在这里商榷《我们》
编撰事宜



1924年，朱自清、朱光潜在春晖中学任教时与友人合影。后排左为朱自清，前排左为朱光潜



1924年，朱自清在春晖中学与部分师生合影。前排右二为朱自清



白马湖和春晖中学全景



何香凝所作的白马湖与长松山房图



春晖三贤——陈春澜(中)、王佐(右)、
经亨颐(左)铜像

時進與

亨
頤



春晖中学校训：与时俱进。经亨颐手书



朱自清白马湖旧居

朱自清诗文集《踪迹》，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4 年 11 月初版，丰子恺设计封面



丰子恺的小杨柳屋

《子恺漫画》，1925 年 12 月由《文学周刊》社印行，作者自行设计封面。书前有郑振铎、夏丏尊、丁衍铺、朱自清、方光焘、刘薰序，书尾有俞平伯跋



夏丏尊的平屋

《平屋杂文》，夏丏尊著。1935 年由开明书店印行。书名作者自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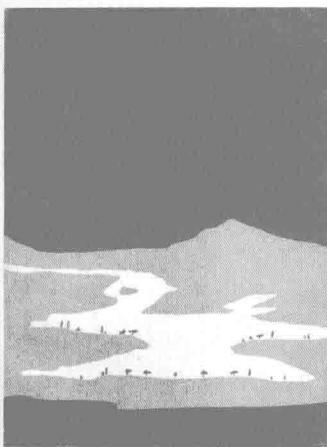
作者留影于白马湖畔



宁波文化研究会留影
二排左起第六人为作者



“白马湖文学”论坛合影
前排左起第四人为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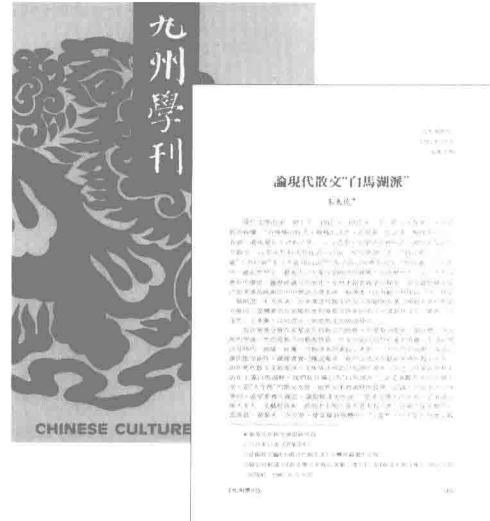
《白马湖散文十三家》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4年5月版



《白马湖文派散论》
香港国际学术文化资讯出版公司
2006年8月版



《白马湖文派短长书》
宁波出版社
2014年7月版



《九州学刊》内载文论《论现代散文“白马湖派”》
该刊系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办
1993年秋季卷

绪 言

(一)

白马湖散文作家非有意立派。白马湖派的得名,从根本上说,主要是这群人能够拔戟自成一队的创作实绩,并得到世人的推重所致。其最大的成绩,乃是现代散文的创作。在20世纪的20年代,以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为轴心的一批散文家,创作了独具一格的以清淡为艺术风味的小品散文,由于那些文字文格洁净、文味清淡如白马湖的湖水,加之以作家此时都在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又在宁波市立四中)劳作与生活,故被称为“白马湖派”。

独特的风味或风格是维系流派生命的血脉,“味”重于“形”也应是适合白马湖派的(对待组织形态不甚严密的流派,“以味不以形”之变通,不失为一种研究之法)。这是因为风格特征是文学流派的本质,也是流派的生命所在。就散文白马湖派而言,究竟能否算是一个独立的文派,其关键在于对其整体创作风格的确认。而围绕流派风格的形成,就有时代思潮、地域人文,乃至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审美情趣,甚或彼此相仿的人格类型等因素,其中流派风格当为主要基因。

(二)

白马湖散文的别有建树,是因为可与语丝派比肩。“白马湖之群”与“语丝之群”,两者有相承的一面。然它不是“语丝之群”的旁支别系,而是“别开门径”的一派,虽有联系,但当是“土生土长”的。1991年发表的拙文《现代散文“白马湖派”研究》,对此作了专论。当代散文家金梅在1992年(7月号)的《散文》上,发表《白马湖派散文家》与之呼应。文云:流派作为一种

文学现象，产生和存在于特定时空和人际关系中。从这个意义上判别，白马湖派散文家可以包括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冯三昧、方光焘、刘薰宇等几家。叶圣陶虽不是春晖中学教员，但也曾在那里作过短期讲学，又与夏、丰、朱、刘等意气相契相合，后与夏还结成了儿女亲家，因此，也可以将其暂时（文学流派本是流动不居的）归入白马湖派散文家中。在这派散文家中，夏丏尊可以作为代表。他不但出生在白马湖边，在那里也生活得最久（象山下有他号称“平屋”的居室与书房）；其人品、文品与文章风格也最典型。他的观点与拙文可谓不谋而合。在1994年出版的拙编《白马湖散文十三家》选编后记——《红树青山白马湖》中说：现代散文“白马湖之群”和“语丝之群”已成南北汇合（“语丝”之取名，便是从顾颉刚带去的宁波分会所办的《我们的七月》中找来的；语丝时期周作人又不脱浙东人的气质，赞赏浙东文化的飘逸与深刻，希望写出平水的山光，白马湖的水色），从而构建了二十年代散文鼎盛期以周作人为领袖的清淡小品散文的“一个很有权威的流派”。这是从现代散文史宏观的维度审视所得的结论。这个很有权威的流派的领袖人物乃是周作人。这从周作人为俞平伯的《知燕草》所写的跋文中似可解说之。周作人曾称俞平伯“为近来的一派新散文的代表，说‘是最有文学意味的一种’。这种文章的特点是：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有人称他为‘絮语’过的那种散文上，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谈，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他称赞俞平伯和废名的散文“涩如青果”，其实这也是他所追求的，那意思说是说小品散文须有经得起咀嚼的回味的余味。可见，这一派新散文，实是周作人自己为“冠冕”的“一个很有权威的流派”。而它的构成基础，确凿地说，乃是“白马湖派”与“语丝派”。两群之中的串联之人则是俞平伯与顾颉刚（其中俞平伯，他既是语丝派，又是白马湖派。然无论怎么说，俞平伯总归是属于周作人这个流派的）。俞、顾友谊甚笃，1924年顾曾抄存了与俞平伯的书信五通，钉成一册，题为《与平伯书》，其中1924年5月15日的一封信，连同1918年5月17日的信，俞平伯还发表在《我们的六月》上，而博得周作人的赞赏。1924年11月2日，顾颉刚出席《语丝》刊名讨论会，他带去刚于7月出版的《我们的七月》，当会上大家定名时，顾颉刚读着《我们的七月》里

的张维祺的《小诗》第一首：“伊底凝视，/伊底哀泣，/伊底欢笑，/伊底长长的语丝，一切，伊的；/我将轻轻而淡淡地放过去了。”提议把“语丝”两字作为刊名，这就成了《语丝》的刊名。可见，语丝派的《语丝》与白马湖派的《我们》在内核和外在上的联系。然而，这两个流派还是彼此独立的。从理论上讲，一个文学流派自立的程度，有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创作特征的共性的集体呈现。语丝的随意而谈的文体于自然中透出谐趣与诗趣。“白马湖派”的散文创作，台湾学者杨牧简要地指出，是“清澈透明，朴实无华，不做作矫揉，也不讳言伤感”。基本上抓住了白马湖作家群体的散文风格，宛如白马湖清淡自然、隽永洁净的湖水，他们的散文实显露着趋同的意境。这一风格特征，夏丏尊的《白马湖之冬》、朱自清的《春晖的一月》、俞平伯的《忆白马湖宁波旧游——朱佩弦兄遗念》、丰子恺的《山水间的生活》、朱光潜的《无言之美》洵可谓范本，对“白马湖风格”做出了最佳的诠释。对于“白马湖派”而言，纯粹是由于它是在形成散文创作的艺术共同风貌后得到研究者的推重，其内部并没有富于宗派或团体意识的文件，因而，关于白马湖派散文家阵容的测定，就显得特别为难。尽管他们的本意并不成就有什么派，而实际上师事或友朋的形式也约略概括白马湖派的形态特征。虽然其构成形态较为松散，这种松散性也呈现出一种生机，一种特色所在。

(三)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文学流派，他们艺术作品自有大致趋同的创作风格。尽管散文家写作时并不想到要当什么派，但他的审美情趣，他的文艺观点以至创作倾向，无形中还是支配着他，使他写出艺术风格相似或相接近的文艺作品。白马湖派散文家“自由地发表那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他们作品的题材、风格、语言，却实实在在地满熏着白马湖的浓郁的“土气”，它受着浙东那独特的“培养个性的土之力”的推动。从精神层面说，具有一种平民意识与人道关怀。他们能够把一种诗意融入清淡的文风中，也即兼具浙东土味的自然质性与白马湖风格的清淡隽永。这是浙东地域“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们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周作人语）的一种风格。

考白马湖散文的艺术特色，属于清淡之体，即清隽平淡是也，这并非平

铺直叙，这淡亦非玄言诗那样“淡乎寡味”，这种平淡是铅华落尽后的天然风姿，是绚丽灿烂至极后的返璞归真，是合乎天地万物节律的天籁。此种韵味隽永的清淡美大抵是白马湖散文的艺术共性，自然他们又有着自己的风格。风格成于个人，流派建于集体。凡属于同一流派的作家必然在各人风格的基础上，表现出共同的东西，必然在众多的独特风貌中显示出大体一致的美学倾向，一种共通的美学追求。白马湖水那样的清淡，正是他们艺术上的共同追求点。他们各人的创作风格固然各呈特色，但都内含着清隽淡泊的共同性的神韵风骨，一种清淡美。这是一种有着出淤泥而不染的清纯，与初日相映焕的清鲜，如天地所造就的自然，以及同朝气共氤氲的明爽的美。

朱自清的写作大体为朴实清新一路，他的散文虽有某些“造作”之处（“像《绿》《匆匆》等篇，辞藻多，渲染重，与平易、自然的风格大异其趣。这反映了‘五四’时期一种流行的风格，并不是朱先生散文的本色”），这是草创期作者文体意识强烈，过分经营“作法”，强调修辞所致，但从总体上看“仍能够满贮着那一种诗意”，具有诗的情韵，诗的意境，诗的凝练，可说是颇具情致的散文诗。此外，“另有种真挚清幽的神态”，此种“清幽”正是白马湖“土气”所在。夏丏尊《平屋杂文》，在平实而清淡的文笔中，构思严谨，在曲折的层次和波澜中，蕴含着浓郁的情致，深远的遐想。表现为具象与情绪兼具，自由中体现精严的技巧、淡而有味的整体特色。此中平淡正有着白马湖的“土气”。丰子恺散文，郁达夫评之为“清幽玄妙”，还弥漫着宗教香火的烟息，他师承李叔同，李风格幽微淡远得很，他是由绚烂之极而回归于平淡。丰氏之清幽，正像赵景深所说，“只是平易的写去，自然就有一种美，文字的干净流利和漂亮，怕只有朱自清可以和他媲美”。而朱自清与叶圣陶，赵又说他们“清秀”，这都是因为浸润着白马湖的“土气”。至于朱光潜、俞平伯，他们的散文似乎也属平淡之体，其中不乏清顺自然之“土气”。这当中朱光潜羡慕的只是周作人的“清淡”，他推崇“清淡”，意在寻求生活的艺术。而俞平伯散文的发展，则经历了从繁缛到素朴的路。换言之，他的散文的“文学意味”，由秾丽到淡雅的变迁。他的追求“趣味”的洒脱的名士风，隐含着自然适意的“土气”，其由因恐怕是他的白马湖之旅。白马湖派散文家的各自

风格上表现出共同的东西，便是形成白马湖派的基础。

白马湖散文的隽永，其仪容所显示的秀，而内容则注重一个“味”字，平淡之为味，以原味取胜，文之本“味”无穷。唐代的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强调诗要“辨于味”。他把“味”放在诗的首位。不辨味，则不足以言诗。这种味，既不是酸味，也不是咸味，而是味在酸咸之外的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其实白马湖派散文家何尝不是如此？他们或流连于山间明月、江上清风之间，或阐述着艺术化的生活，或书写自我的个性，皆使文章之“味”无穷。诚如台湾学者张堂錡所论及的，“以散文美学的艺术风格来论，平实隽永，真而有味，是他们创作的基调，魅力之所在”，自然也是他们的作品的真味。这种味，好就好在：她给你的绝不是生理上的快感，而是心理上的美感。这种美感，妙就妙在：她使你的心里感到甜丝丝的、乐滋滋的，然而你却说不出来。这就是言近旨远、意味无穷的境界，也是隽永之味所追求的极致，以至于明心见性的流露，天然本色的自然呈现。白马湖散文有些篇什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调和优美的辞藻于一起，看似文字瑰丽，外形很美，然而我们感着的“内美”，也还是那样的自然而然，并非是人工的雕饰和涂绘。这是清淡和腴润的对立统一，清淡而不寡淡，腴润而不肥腻。不过是统一于腴润，因而这些篇什本质还是素朴，即所谓“腴厚从平淡出来”也。这是否与浙东人的嗜好与口味有关？浙东人性喜清淡而腴润，此谓浙东吃食知味的至真、至善、至美的最高境界。移之为文亦是这样。你看“不脱浙东人气质”的周作人，他的文章清淡而腴润。其《〈雨天的书〉自序一》，就是以极短之篇幅达到极淡之美的典范。平淡非枯槁，相反的倒是要腴润。周之作文崇尚的即是清淡和腴润统一之美。初读它会觉得很淡，他用那种平民风和你交谈，感情是淡淡平平的，让你会感着很是闲适，其实不然，细加体味，内含着腴厚的甘美。而白马湖散文的隽味、“土味”，恰是周作人小品散文之冲淡韵味（冲而不薄，淡而有味）的传承。不是吗？周作人的《苦雨》《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以至《乌篷船》《鸟声》多完成于1924年至1926年间，此后仿者蜂起（如钟敬文散文是仿周氏的。王任叔说他从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里走出来的）。而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等白马湖派散文家其时日渐成熟，合二为一，便构成中国现代散文南（白马湖派）北（语丝派）

回响与呼应的态势，尔后完成向“文学”提升的文体嬗变。

(四)

散文这种文学样式是“情种”的产物，可说是万变不离其情，不论是事、景、理为主要特征的散文，均应有情贯穿其中，情不贯，文不立。散文，极言之，可称为情文。白马湖散文，即是情文。作文者的名字简直与他们的情文篇名融于一体，难分难解。提起《背影》《平屋杂文》《缘缘堂随笔》《未厌居习作》《山中杂记》，人们顷刻会联想起将自己感情全部浸注其中的作者——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叶圣陶，郑振铎。白马湖派散文家十分重视感情对于文学创作的作用。1924年，朱自清针对宁波有人对《我们的七月》的评论，作了回答：小品散文之吸引人，“最大因由却在情感的浓厚”，并说，此“不可强为”。同年，他在宁波所作的《我们对于文学的态度》演讲中，又表明自己的创作态度：“觉得感情无谓者，宜节产”。夏丏尊也有类似的意见。他认为文学的特征一谓“具象”，第二是“情绪”，文学作品“只把客观的事实具象的写下来，使人自己对之发生一种情绪，取得其预期的效果”。丰子恺曾指出：“艺术的根本原则，是关切人生，近于人情”。叶圣陶认为“真的艺术品有一种特质，就是‘浓厚的感情’。我们若说这是文艺之魂，似乎也无可”。郑振铎说，文学的“使命”和“伟大价值”，就在于“通”人类感情之邮”。感情的冲动，情绪的宣泄乃是白马湖派散文家创作的缘由，作为沟通人我决不可少的洋溢在文中的情感，要求作家由“情生文”“情至而文生”，读者读文才能引起共鸣。我们且不说朱自清读了父亲的来信，感情结郁于中，发之于外，遂成了不朽之作《背影》。即便以夏丏尊、郑振铎的《猫》和丰子恺的《白鹅》所写动物而论，也赋予人的感情，前者可谓一曲深情的挽歌，写的是猫，实为借猫写人，写人的感情；后者是怀着“好比为一个永诀的朋友立传、写照”的深情来写这篇散文。白马湖散文的独特处，就在于作者们把感情的冲动深深地掩埋在心里，谁也无法觉察；从表层看，他们只是平实地写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感兴，平淡之极，但平淡之中，蕴藉着深情。他们把真挚的情愫，包容在平常的生活场景中，以清疏平淡的文字出之，有几分动情就陈述几分，既不回避藏匿，也不强为渲染宣泄，故作多情。即使如此，我们